

战火中的大学

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

成仿吾

人民教育出版社

战火中的大学

成仿吾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4 字数 130,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书号：7012 0475 定价：0.65元

目 录

序言——教育革命的道路

第一章 陕北公学

一、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展抗战教育.....	13
二、创建陕北公学.....	17
三、革命的政治教育.....	26
四、民众运动和政府工作教育.....	32
五、军事教育.....	36
六、劳动教育.....	39
七、陕北公学分校.....	41
八、陕北公学女生队.....	46
九、校风——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49
十、陕北公学学生会.....	53
十一、陕北公学流动剧团.....	57
十二、陕北公学办学过程中的斗争.....	63
十三、毕业上前线.....	66

第二章 华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

一、从栒邑到延安.....	71
二、党中央、毛主席欢送我们上前线.....	73
三、东渡黄河.....	79
四、翻越吕梁山、云中山.....	82
五、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	85

六、华北联合大学的旗帜插在敌人的心脏上.....	90
七、在敌后开学和第一次参加反“扫荡”战斗.....	95
八、晋察冀边区的最高学府.....	102
九、华北联合大学的扩展.....	109
十、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的浴血苦战.....	112
十一、渡过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	116
十二、喋血敌后战场，迎接抗日胜利.....	121

第三章 华北联合大学（解放战争时期）

一、张家口阶段，复校和走向正规化.....	128
二、从张家口到束鹿，八百里小长征，重返农村.....	135
三、从束鹿到正定，向石家庄工人阶级学习.....	142

第四章 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147
二、华北大学各部情况及课程设置.....	152
三、从正定到北京.....	156
四、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	158

序言——教育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祖先是很重视教育的。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

根据文献资料，我们古代在夏、商、周三代时，就有了“校”、“序”、“庠”的记载，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学校吧！不过，这种“校”、“序”、“庠”究竟是怎样的学校组织，各书记载的并不详细，也不统一。有的把它们说成是不同朝代的不同称呼：“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也有的把它们当作同一朝代（周代）的各级组织：“家有塾，党有序，州有庠，国有学”。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曾对这种古代学校组织十分赞扬，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序，州有庠，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郑观应：《学校》。《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02—903页）郑观应把古代学校说得这么好，目的在于提倡西学，按照西方那样办洋学堂。至于中国古代学校，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好（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还是值得研究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遥远的古代就是很重视教育的，那时就有了“校”、“序”、“庠”

这样的学校组织。外国学校的出现恐怕没有中国这样早。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看来，“校”、“序”、“庠”还都是一些公办学校，学生也不会多，只能是一些氏族长、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之类的少数人，主要是模仿，重在实践。私立学校要从春秋时代的孔夫子说起。孔夫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的学校里有自己讲学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送一束干肉，就可以认他作弟子。他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生有颜渊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但是，孔夫子的教育主要也是为一定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也注重实践，他教育人们不要犯上作乱；他修《春秋》的目的就是在于正名分、寓褒贬、使乱臣贼子惧；他的弟子有很多人做了大官，取得很高的地位。

秦汉以后，选拔人才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汉至隋为一段，自唐至明又是一段。前一阶段是以选举（即推荐）为主，间用考试；后一阶段则是以考试为主，参用科举。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选举或考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是从现有的人才中甄拔，而不是从未成的人才加以教育。就是说，忽视了学校教育。唐宋以来，各地设立书院之风，虽甚盛行，但它也主要是为当时的科举制度服务的，侧重语言文学的。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资本主义也在客观上发生和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病愈来愈暴露得明显，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力倡导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而办学堂，并引中国三代就有学校设置以为证。而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感到再拘泥科举制度，偏重语言文学，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统治的需要，也不能

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清政府才不得不于一九〇五年八月正式下令停开科举，广办学校。

但，教育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就在清政府下令停开科举、广办学校的同时，仍然强调了“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6页）。因此，学校虽然开办了，但仍多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拿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来说吧，当时的学生仍是出身于举人、进士的京官。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虽然改为北京大学，但仍然沿袭着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学生仍然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对教员的评价，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因为老师有地位，学生毕业后才有靠山。

蔡元培是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值得纪念的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作了若干改革。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对这个学校作了重大改革。他遵循“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因而使北大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在客观上就为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获得了一个活动的园地，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个可以传播的场所。我国许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同志，都曾在当时的北大工作或学习。

那时的北大仍然是一所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在那里，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还有胡适派的影响。后者的影响恐怕比前者还要大些。因此，从北大出来的不仅有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更多的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的得意弟子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等人，后来大

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至于其他的外国人直接办理的教会学校，学费昂贵、招生很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还是爱国的，但确有少数人數典忘祖成了洋奴买办。毛泽东同志曾说：“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友谊’，还是侵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买办”和“奴才”，事实上，与帝国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我们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有的也是在这些学校中学习过的；多数毕业生和留学生还是有爱国心的，现在成了为新中国服务的各门学科的老专家；毛泽东同志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就帝国主义的办学目的和愿望来说的。就是说，它的教育是为它的侵略中国的政治服务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时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站在政治之外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我们公开声明，说学校可以在生活外，可以在政治外，这是撒谎和伪善。”

列宁的这段批判，对旧中国也是适用的。毛泽东同志上面的那一段话，也就是这个意思。

旧中国确实有广大的失学失业的爱国青年，他们希望从学校中求得真知灼见，具备真才实学，以便为祖国贡献力量。但是，旧中国的那一套教育制度，理论脱离实际，所学非所用，使他们大

都不能如愿以偿，毕业即失业，仍然找不到出路。记得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批评旧大学所学非所用的时候，曾生动地举了鲁迅先生也举了我的例子，因为鲁迅在日本是学医科的，我在日本是学工科的，结果却都成了用非所学。

总之，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是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十分强调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生活。重视教育必须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而要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特别是在苏区和解放区中）服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发现人才，培养干部，使千百万的优秀人才从火热的实际斗争中成长、壮大。

为革命事业服务，从革命实践中培养干部，这决不是说可以取消学校教育。政治和教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应该包含的不同内容。一些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一些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理论知识和专门技能，是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专门进行传授的。实用主义者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即取消学校教育的观点，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不取法的。

因此，我们党建立后，虽然面临着十分紧迫而复杂的革命斗争，但不论是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十分重视学校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提高文化。

至于学校教育的形式，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条件，随时都有所变化和发展。例如，一九二一年十月就在上海开办有平民女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间，又开办了上海大学（共分社会学、中文、外文三系，以社会学系最大，由瞿秋白同志任主任）。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我们党又参加办黄埔军校，派周恩来同志去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邓中夏、刘少奇同志在

广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劳动学院，邓任院长，刘任教授；至于毛泽东同志等在广州、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苏兆征同志等在武汉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和红军领导人民创造了广大的红色区域，因而也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教育体系。

当时，红色区域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红色区域文教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同上）

根据这个总方针和中心任务，各个根据地的党组织采取了革命措施，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创造了各种崭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奠定了革命政权下的新教育制度。所有这一切，才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大革命。

一九三三年，党在瑞金成立了共产主义大学，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同年还成立了苏维埃大学，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劳动、教育、司法等班。还设立了工农红军大学，以培养军事干部。设立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以培养教育工作干部和学校师资。此外，还设有各种技术学校和军事特科学校，如无线电、卫生等技术学校，工农红军步兵特科学校等。虽然由于战争环境，学校的设备简陋，学习期限短促，但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来办学，却培养出为党为人民所需要的大量的优秀革命干部。

除上述学校教育外，根据地内还普遍实行社会教育和儿童教

育。社会教育的形式是在农村中普遍设立夜校，儿童教育的形式则是在农村中普遍设立列宁小学。一九三〇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13%；而红色区域内，如兴国县的入学儿童，却占学龄儿童的60%以上。

说到红色区域的革命教育，我们非常怀念无产阶级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徐老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应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书特书的。徐老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和瞿秋白同志一道被任命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秋白同志为部长，徐老为副部长。但秋白同志从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初还未进入中央苏区，所以红色区域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老负责。

徐老不仅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而且亲自创办师资训练班，不久，就发展成为中央列宁师范学校。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什么都做。徐老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着，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他在瓦窑堡仍旧办列宁师范学校，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他一人兼任。有一次，我到师范学校去找这位徐校长，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找到伙房，才找到了他，原来这位老校长正在帮厨给学生烧饭呢！他这种精神，真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师表。

一九三一年，我从德国回来，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担任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长和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的主席。那时，负责审查各县的识字课本，也自己动手编写识字课本。去年湖北省还给我送来一本当时英山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翻印的列宁小学校使用的《识字班课本》第二册。这本书是在第一册认识三百字的基

础上编的，共二十九课，都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例如：

第十二课讲土地革命，课文中写道：

风把稻吹成黄的波浪，
热血儿在我心头震荡，
一片前进的呼声把豪绅地主骇得神魂飘荡。

同志们！

快举起镰刀、斧头、大红旗，
求我们自己的解放！

第十九课是讲党的领导，课文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
是豪绅地主的死对头。
我们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坚决奋斗，才能彻底解放。

课文紧密结合革命政治，同时也很重视文字练习，例如第二十三课的课文便这样写道：“我们不但读书，我们还要练习写字。字写的好，才能写信，做简短文字，生活上才添许多便利。”

课文还注意了结合儿童生活的特点，例如，第二十七课便是这样一段课文：“我在路边放牛，路上走来一个叫花子。我怕他是白匪的侦探，向他要通行证。他没有通行证，我把他送到乡苏维埃去了。”

这个识字班的课本是当时由我编审的，时光流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今天读来，倍感亲切。从这个课本看来，可以知道，我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是为它们服务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全民族培养出大量

的政治、军事、文教、财经、群众运动等各方面的干部，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当时国民党区域的高等学校，已纷纷停办。有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但也被弄得破烂不堪，教师不能安心教学，学生也不能安心学习。有的学校则关门大吉。例如原设在青岛的很著名的山东大学，在日本强盗还未打到山东的时候，就搬了家，六、七百人带着图书、仪器，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一路走一边减员，图书、仪器也一边丢散，结果到四川后，人和东西几乎丢散殆尽，办不成学校了。山东大学如此，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高等教育状况，怎么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呢？国民党也有干部教育，办有各种训练班，但是除了一部分实际上由我党人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掌握的训练班以外，大部分国民党办的训练班，在抗战初期只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服务，而在武汉失守以后，便逐步成了灌输法西斯教育的训练班。这是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

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狠抓干部教育，以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因此，在陕甘宁边区，除设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外，又设有陕北公学等培养干部的学校。此后，各根据地也仿效这种榜样，纷纷设立各种干部学校（如建立各地的抗大分校，晋察冀成立有华北联合大学等）。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种干部教育。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说：“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又说：“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

全国解放，即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后，具备了办好教育的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形势也迫切需要提高教育的水平。特别是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果不能提高教育的水平，我们的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例如，为了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一切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又都必须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懂得新时期的政治学、法律学，……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没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一切教育工作者，不管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者是从原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成长起来的，都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而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更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也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因此，思想要不断解放，教育才能不断提高。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没有止境的。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毫无保留的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奉中央指示，我从抗战开始就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后又在晋察冀边区办华北联合大学，以至解放战争期间的华北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时间已经流逝四十多个年头。孔夫子办学，弟子号称三千；我们四十多年来培养的干部何止三万、十万？现在，许多老同学已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不少人已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在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学中出现过不少烈士，这些同学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她)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却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前进！

人民大学建校已届三十周年，复校也已两年多。抚今追昔，我回忆起从陕北公学以来我们在战火中办大学的艰苦的年代，回

忆起在战斗年代，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的同事和同学中那些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的英烈们。每每回忆起这些死难烈士来，他(她)们的音容笑貌还宛然如昨，常使我激动缅怀。我深感有责任把我们在战火中办大学的事迹记述下来。我现在把这些战争年代的往事(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作一个梗概的回忆，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发扬老解放区教育的光荣传统，继往开来，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办好教育，为进一步办好中国大学，而提供一个教育史、校史的史料。

这个回忆，由我口述，由胡华、彭明、刘炼三同志笔录整理。

* * *

人类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宇宙的存在与发展，而这需要无数的世纪。人类社会的教育也同样需要漫长的世纪供它发展的需要。各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首先都经历了漫长的模仿的阶段，这一阶段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有的落后地区，经过奴隶社会，甚至封建社会，还保留着模仿的实质。在中国，语言文学的模仿经历了许多朝代，其他知识的教育都是很落后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教育”实行了几百年还很少普及，许多地区文盲才开始消灭。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盲是不能完全消灭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实现了教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些已经逐渐“老化”了，像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早已老化一样。我们由于封建时期特别长，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割据，所以我们的反封建反帝的革命不能是单纯民主民族的，一般资本主义的，而是新的民主主义的，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使得它不能只是一般资本主义的，而不能不迅速过渡到更高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在我们反帝反封

建革命的初期，我们甚至实现了战时共产主义。

西方资产阶级，在它仅仅几百年的统治时期作出了前人很难想像的巨大的物质成就，但它唯利是图，目光如豆，在精神方面却倒退了不只一步，它实现的教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仅仅满足了它剥削的需要，对人的要求只是以满足资本的眼前利益为限，别的东西不在它考虑的范围内的。这连各种霸权主义也不例外，因为它本质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虽然戴着各种各样的假面具。

我们从新的民主革命开始，就走了另外的道路，我们的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方针贯穿在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是教育工作的准绳。我们可以把教育工作理解为在德育、智育、与体育方面全面发展，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的教育显然不能是资产阶级的，而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它只能是为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服务的。

第一章 陕北公学

一、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展抗战教育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第一所革命的大学，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满足全面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需要，坚持国防教育培养万千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干部而创办的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于延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把侵略战火由关外燃烧到华北，燃烧到全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强占我国土，掠劫我财富，残杀我同胞，妄图用野蛮的暴力征服中国，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要奴役我中华民族，而且也要用一切野蛮手段毁灭我文化。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里，高等学府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古代文物被劫掠，历史文献被焚毁，清华、燕京等大学被轰炸，十多万青年被迫失学。日本侵略者轰炸天津尤为残酷，北方最高学府之一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日本法西斯的炮火下，转瞬间化为焦土。上海、江、浙一带的文化机关、高等学校都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迁到长沙的清华大学也未能逃脱被炸的命运。山东的大、中、小学、文化机关也相继被摧毁，山东大学被迫西迁，一路上人员四散，图书仪器毁弃殆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空前的文化浩劫。

中华民族不甘被奴役，中国的优秀青年更不能坐视祖国和父兄姊妹受此凌辱。早在七七事变前，他们就奋然突起，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但是被节节退让实行不抵